

长城与民族

李凤山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城与民族 李凤山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陈星苑原书设计 陈星苑原书设计

I ①长… II ②李… III ③长城—关系—中华民族—研究 IV ④D63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长城与民族

作 者 李凤山
责任编辑 宁 玉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010-62512345(发行部) 传真 010-62512345(发行部)
010-62512345(总编室) 010-62512345(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787 毫米) 1/32 印张 4 插
字 数 15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陈星苑原书设计 陈星苑原书设计 陈星苑原书设计
定 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出版总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 1951 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1954 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1956 年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1960 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先生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55—1985 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我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一、积极了

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向，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 缘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缘个民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 圆圆园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圆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圆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圆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圆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圆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缘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序

感谢中国长城学会的倡导、推动与组织，近年在中国兴起了
一门新的学科，在国内外学术界颇受关注和重视，这就是长城
学。在长城学会初期的发展中，我也曾努力参加讨论，并在
1990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大会发言，题为《万里长城说》，
对长城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及长城的性质、作用、历史与文
化意义等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文已收入《长城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

惭愧的是，虽然中国长城学会每每邀我参加研究和考察活
动，长城学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发展，而我自己由于工作和健康的
原因，对长城的研究算是半途而废。

可喜的是，李凤山教授在长城与中国民族及民族关系等学术
领域作了专题性的深入研究。他不仅对文献及理论方面作了认真
而深入的探讨，还积极参加了中国长城学会所组织的一系列实地
考察等活动，从而丰富了研究的内容。现在奉献给社会的是一部
关于长城与民族及民族关系史的专题论文集，其学术成果既有广
度，又有深度。对长城学而言，是一个可喜的新成果；对我个人
而言，更庆凤山后来居上。高兴之余，写了以上感言，称之为
序，实不敢言序也。

陈连开

1992年 7月 1日

前 言

这是一本专门探讨和研究长城与民族关系的文集。之所以出版这本文集，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是呼吁民族学界、民族史学界、社会学界充分重视长城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其实，严格说来，我的有关长城与民族关系问题的文章，数量并不算多，也并没有个人目的诉求。我之所以有意将其结集出版，重要原因之一，是十数年来，从我所能看到的与此有关的一些著作和文章中，听到的少数专家和人士的言论中，觉察并发现一些有关长城与民族关系方面不妥当的言论和提法。为此，我在过去的发言或有关场合的谈话以及有关建议中，曾经谈过我的看法，还为此专门发表过《长城与民族关系研究之我见》的短文。总之，十数年来，尽一切可能，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场合，有针对性地陈述我的观点。而今出版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仍然如此。希望我的这些文章的观点，能够影响一些人的不妥当的观点，纠正一些错误的认识和不恰当的提法，为进一步加强关于长城与民族关系课题的研究，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尽绵薄之力。

二是长城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同国内外学术研究和政治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数年以来，国际上已经有一批学者在进行“环渤海文化圈”、“环渤海经济圈”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有涉及到环渤海考古文化的研究，但规模和影响不大。今天，国家准备启动“京津冀都市经济一体化”战略规划。而我们进行科学研究，是否可以把战略眼光再放大，即以整个东北亚为着眼点的“环渤海经济文化圈”观察和设计研究课题？总之，这样一个大的国内国际的历史和文化、经济战略背景，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在退休前曾经有过“长城与环渤海文化圈”的研究设想，

限于种种原因没能实施，仅在《回首万里行》一文中有所反映。希望在新的情势下，能够有学者展开“长城与环渤海经济文化圈”的研究。

三是呼唤，呼唤人们在开发利用长城的时候；在休闲游览观赏和品味长城的时候；在生活和生产当中，要关心长城的痛苦和命运，要自觉培养并形成爱护、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国宝——长城的意识。

人们对于最熟悉的事物往往不甚在意，即熟视无睹。我长期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京，很早就知道长城的存在，也不止一次去游览过长城，但有关长城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直到 1980 年之前，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学术研究视野，而且连想都没有想过在学术上对她进行什么关注，还真有点熟视无睹的味道。

原来，我的学术研究着眼点是“南方少数民族民俗与文化研究”，种种原因，研究极其困难，进展极其缓慢。

一个偶然的机，即 1980 年 8 月 15 日，中国长城学会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召开了一个有关长城研究的座谈会，我在会上发了言。会后，在长城学会有关人员的要求之下，草就了《长城——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纽带》一文，并在当年 10 月召开的“山海关首届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上介绍了我的观点。会议休息的时候，学界老前辈单士元先生主动找到我，肯定我的观点说：“很好，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在九门口长城上，原外交部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国长城学会会长的黄华先生，在肯定了我的学术观点的同时，让我在修改的时候要“再多注意运用具体史料、具体事例”。老前辈们对我的观点的如此关注和中肯的意见，今天回忆起来仍倍感亲切。撰写会议论文，是我研究长城与民族关系方面问题的开始和处女作，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十分仓促，来不及查找更多的资料，主要是凭着直觉，凭着手头有限的资料，凭着所掌握的中国民族关系、民族学、民

族政策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凭着自己平时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中的一些有关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提出了“长城带”、“民族融合纽带”这样的概念性观点，尽力论述长城带在民族融合中曾经发挥的作用。会后，经过一定的修改，发表在《长城学刊》~~1985~~年第~~1~~期。后来，吉人先生在《长城研究史》一文中评论此文时认为，“持融合说的论述最为全面的，是李凤山先生发表在《长城学刊》~~1985~~年第~~1~~期上的《长城——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纽带》一文”，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次收录文章时，由于仍然感到该文显得有些粗糙，更主要的是，由于该文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已经反映到《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长城带民族融合的特点》等文章中，故未将该文收入本书。

山海关学术研讨会之后，“长城带”这一系统概念，被许多学者认可，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广泛使用。其后，~~198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长城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肯定了这一概念。

“长城带”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纽带”的观点，只不过是对于数千年中国民族关系史史实的客观反映，却引起了学术界的认可和广泛注意。为此，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本社外报部”編集委员堀江义人先生，专门来中央民族大学同我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的座谈，了解民族融合的状况。可见，我的观点为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某种活力和新的思考点。

十数年来，我把学术研究的主要精力转移到长城学科的研究，转移到以万里长城为中介的长城与民族关系、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退休前的六七年中，由于忙于教学及日常工作，原来曾经设想的许多论题无法实现，仅仅完成了几篇梳理性文章。加之当时的条件限制，仅仅收集了部分资料，数量有限，数篇文章也存有一定程度的重复使用某些资料的现象。这种

情况，虽然说在同一类型课题中引用相同或相似的材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由于不同文章的着力点不同，为了保持每篇文章的结构和完整性，在结成此集时，未做大的改动，从而留有一定的缺憾。内中也表明，研究此类课题，不仅仅需要查阅并占有更大量的资料，还需要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去——到有关重要地区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有这类调查研究的材料同历史资料紧密结合，才能尽量减少上述缺憾。也正因如此，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更多成果的形成。尽管如此，经过几年的研究，还是自认为对于长城学科中的“长城与民族关系”课题的研究做出了几点贡献：第一，提出了“长城带”这一系统概念。当时考虑到，虽然长城号称“上下两千余年”，“纵横数万里”，“体量巨大”；虽然长城蕴涵着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和建筑、艺术魅力，然而，它毕竟是历史文物，在中国大地上，万里长城本身只是一条线。而民族与长城所发生的关系却不同，在两千余年间，所有同万里长城发生历史关系的有关民族，一直是活动在以万里长城为中介的广阔地域范围之内的，其本身也曾发生巨大变化的人类群体，他们是活动的、动态的群体，在两千余年间，他们不仅与长城发生过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人类群体之间也发生过种种密切的联系，而正是这种种联系，在长城沿线演绎了一幕幕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活剧。我认为，对于这样的历史的动态关系，仅一线物化了的长城，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替代和反映的，因此，我才选择了“长城带”这样一种概念。第二，提出了长城“民族融合”带的概念。根据我对于所掌握的历史、民族学知识的理解，根据我对于万里长城南北数千年来民族发展变化的观察和认识，发现它是长城带上一种非常突出的人类生存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于是，很自然地、顺理成章地使用了这种概念，没有过多考虑民族学界所谓“民族融合”定义的说法。第三，提出并实践：研究长城与民族的关系，不仅要站在“长城内”看长城，而

且要站在“长城上”看长城，还要站在“长城外”看长城的观点。我始终认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万里长城与民族关系问题，不能仅仅用汉民族的观点去观察、认识长城，也不能仅仅用中立的观点去观察、认识长城，还必须站在曾经与长城发生过密切关系的其他民族的观点去观察、认识长城，我们要历史地、客观公正地看待长城带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关系，要戒除大汉族主义或者其他错误的、片面的观点，排除各种不应有的戒心，坚持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历史，是由历史上的和现今的各民族共同缔造和书写而成的客观的历史史实，辩证地看待万里长城以及它同民族关系之间的关系，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的继续发展聚集能量。

长城学是一门新兴起的学科，许多学人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长城旅游热潮不减，促进和带动了长城学科的研究向更高的深度和广度发展；长城与民族关系的研究也已引起世人的注意，但却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还仅仅是刚刚抬起了一只脚，这只脚还没有落地，还不能说形成步子的阶段，它在长城学科中的影响还极其微弱，研究队伍还未形成，现阶段还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成果。有鉴于此，才有意将我所写的关于长城与民族关系课题的数篇从宏观上进行梳理性的文章，集成一册，就教于同仁，也算是我十数年来对于长城与民族关系问题关注的一个总结吧。同时，更主要的目的，是企图以它作为引玉之砖，抛给对此课题感兴趣的广大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有着广博的历史知识、民族学知识、民族史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的学者，期待他们对此课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投入一定的精力，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更大成绩，形成一批称得上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造就一批研究长城与民族关系领域问题造诣较深的人才，推动长城学科的研究，推动长城与民族关系课题的研究和发展。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如若能够因此而引发一些争论，将此

一论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将是我的更高期盼。

在这本专题论文集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提到我的老师陈连开教授。我在学生时代就深受他的史学思想的影响，而我对于中国民族、民族关系的认识更深受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启迪，当我从事长城与民族关系的研究之后，又深受他的关于长城的性质、作用、历史和文化意义等方面看法的影响。因此，我极想请他为我的论文集的出版作《序》，而他的身体欠安，使我犹豫再三。当我鼓起勇气提出之后，他欣然同意。为此，我在为影响他安心养病表示深深的歉疚的同时，更真诚地表示我由衷的感谢。

在这本专题论文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对此书出版予以积极支持和资助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感谢我的小学及中学时代的同学雷励先生主动帮我绘制《万里长城示意图》；感谢民族出版社的石朝慧女士提示并鼓起我出版这本论文集的勇气；还要感谢所有为我的论文集的出版给予热情帮助和支持的朋友。

著者

二〇〇九年 庚子月 二日

目 录

前言	1
长城与民族	1
论长城带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1
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	1
长城带民族融合的特点	1
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述略	1
长城带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与变迁	1
长城与民族关系研究之我见	1
回首万里行	1
苍凉与揪心	1
高标准做好长城的保护与开发事业	1
长城情感与长城的新作用	1
后记	1

长城与民族

以雄峙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万里长城为中介的南北广大地域所构成的长城带，大致包括今天的淮河和秦岭一线以北的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和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也包括某些历史时期处于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半岛的若干地区。其范围，南北约各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这里自远古至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在历史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尽一致，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尽相同，经济文化差异性很大，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是观察和理解长城带一切事物的关键所在。

在历史过程中，长城带的古代民族，有些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又融合生成，它们都与当今分布在长城带的 ~~图~~ 多个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无论是已经消失的还是至今仍在继续发展的各民族，都曾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是历代民族形成及其消长的见证，承载着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和文化；长城自存在之日起就与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长城的演变中，民族成为长城最为关键的复合体，成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今天长城学研究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它的内涵最丰富，它的表现最活跃，它的内容及其意义最重要，因此，要正确认识并掌握长城与民族的关系，只有正确认识民族与长城的内在关

系，才能正确认识历史过程中发生在长城带上的政治、军事等历史事件的本质，才能正确认识长城带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内涵及其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对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

长城带的经济结构与民族格局

经济文化结构 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所构成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决定了整个中国大陆古代的经济、文化大致分为东西两大区和南北三带的天然布局。两大区即北起兴安岭，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岷山至横断山脉一线，其东为农业经济发展地区，其西是畜牧业，间有河谷和绿洲的小块农业或农牧经济相结合的发展地区。三带即秦岭、淮河以南为水田农业经济发展带；其北至阴山、燕山以南和东北平原是旱作农业经济发展带；阴山以北、贺兰山以西为畜牧业经济发展带。两区三带的天然布局，构成古代中国大陆的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长城带包括了整个旱作农业经济发展带和畜牧业经济发展带的绝大部分地区，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长城带在经济上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补充，两种经济相互依存，互相补充。长城带在文化上则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农、牧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和吸收，不断汇聚与辐射。在历史过程中，农业首先在被称为中原的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成为整个中国农业经济、文化的腹心，并成为全国交往汇聚的中心。在整个畜牧业经济地区，自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的内蒙古大草原，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成为畜牧业经济、文化的腹心。万里长城，自古就坐落在这两大经济、文化腹心的自然交汇处。它是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的产物，是拥有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民族碰撞的产物。长城既将两种经济、文化隔开，又将两种经济、文化紧密联结在一

起。整个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整体始于修建长城。

民族构成格局 民族构成格局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两大不同经济、文化腹心的形成，标志着两大系统民族的初步形成。西周以降，万里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形成为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统一实体，建立起以早期汉族为主体的强大的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帝国，而近长城以南的黄河中下游的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其政治文化的中心；长城以北的畜牧业地区，也于战国末期形成以匈奴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匈奴奴隶制政权，而阴山山脉为中心的地区成为它的中心。长城的修建，成为中国古代民族形成的标志。而秦汉的长期统一，铸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整体发展的形势。自秦汉至明清，匈奴、氐、羌、东胡、乌桓和鲜卑、突厥和回鹘、党项和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民族反复汇聚长城带，逐鹿中原，形成古代民族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峰，进行一次次民族融合。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实体消失，又一些新的民族实体诞生。到元、明后期，长城带的近现代民族实体都先后形成，构成长城带当代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长城带的民族关系

长城带古代的经济、文化结构与古代民族的构成格局，决定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地区与畜牧业经济地区的关系集中表现于长城一线，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也沿长城一线展开。与此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也集中于长城一线，表现得异常突出，无论是民族间的联合与交流——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还是民族间的斗争——军事的、政治的，都沿长城一线展开，它决定着主体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也决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体系一分为二、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

长城带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与发展 农业和畜牧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农业需要在定居稳定的生产环境下发展生产和进行文化积累；畜牧业则在流动中放牧收获，两种生产方式格格不入，因此，长城带农、牧两大类型的经济、文化自古就有矛盾的一面。由于畜牧业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使之对农业有很强的依赖性，然而，又由于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的局限性，常常造成两种经济、文化的失衡，出现严重的对抗。而古代牧区保留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群社会组织，使骑马民族很容易形成一阵阵军事优势，不断地进入农业地区进行掠夺，造成对农业区的极大破坏。长城的修建与存在，便起到了把农、牧两个民族隔离开来，借以增强对畜牧业民族掠扰的抗御能力，使之不能轻易得逞，从而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有益于社会生产力和封建文明的发展与积累。自秦汉至明朝，控制中原地区的历代统治者，无论哪个民族掌握政权，多数都利用农业社会强大的组织力量，不断修筑长城，同时采取大规模向长城沿线移民、修筑交通通道、开拓边疆新区域的举措，促进了中原和长城沿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交通孔道的打通，长城的延伸，不仅保证了丝绸古道的畅通，同时使农、牧地区一分为二，削弱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区的威胁，使中原农业区与新疆南部农业区联结为统一体。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条通道进而形成为联结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的走廊和重要枢纽，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内东、西部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与辐射的极其重要的输送线，即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所有这些，都为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积累与扩散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需求、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经济需要畜牧业为自己提供农耕、运输用畜力以及战马、各类牲畜、皮毛、珍贵药材等，同时

需要向畜牧业地区出卖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畜牧业地区是农业经济地区的重要市场；而畜牧业经济则需要农业经济地区提供必要的粮食、布匹和铁、铜、锡、金、银、陶瓷器皿等各种手工业品，而且也需要出卖自己的皮毛、药材等产品用以交换。因而，自然形成两种经济的贸易交换沿着长城一线展开。自秦汉至明清，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在历史上便自然成为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系统的民族进行交易的场所或中心，加之特殊情况下的抢掠，使农牧业产品沿长城一线集散，长城一线也便成为了国内最大的贸易市场和物资供求、集散地。在历史过程中，许多关口逐渐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镇，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的风姿，享用它们的桥梁作用。可见，在一定程度上，长城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又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和方便。长城起着调节两种经济关系，使农、牧业两种经济沿着主辅配置的方向有序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又是农、牧经济的汇聚线。如此看来，长城就不单纯是将两种类型的经济文化分隔开来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是它曾担负着将两种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的重任。

毋庸讳言，长城的修建与存在，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藩篱，曾给古代中国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和发展制造了许多不便，带来过一定的消极的影响。长城毕竟成为人为的障碍，尤其当农、牧两区的统治阶级上层因各自的利益而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的时期，掌握中原政权的统治者，往往关闭互市贸易场所和交通孔道，严禁人员和物资进入畜牧业地区，限制和阻碍了农、牧业地区对对方物资的取得，从而给农、牧业地区的各民族都带来不便和困难，不利于各民族的正常生活、生产和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过不利的影响。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的政策而导致的长城的消极作用与它在古代阶级社会对其经济支柱——农